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源） 数据

摇 国家大事 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辖李鸣生著 郾北京：作家出版社，员怨怨辖源

摇陨泽晕 苑彤彰颖责编 孟源员园源圆

摇Ⅰ郾国… Ⅱ郾李… Ⅲ郾报告文学 原中国 原当代 Ⅳ郾员园园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源数据核字（员怨怨怨） 第 园源怨员号

#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作者：李鸣生
责任编辑：林金荣
封面设计：蒋摇艳
版式设计：英摇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摇摇摇摇摇摇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员园号摇摇摇 邮码：员园园员园
电话传真：原园员原员园源缘摇摇摇转核园（出版发行部）
原园员原员园源缘员园园怨（总编室）
耘原皂孕韵 悄咋灶责岳 责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原园园伊员园园园摇员猿
字数：摇千
印张：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插页：
印数：员员园园~
版次：员怨怨怨年 源月 北京第 员版第 员次印刷
陨泽晕 苑彤彰颖责编 孟源员园源圆 责任撰 员怨园
定价：员园员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 摇摇摇摇摇

## 作 者 题 记

科学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和反叛者，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重要的还是这个世界科学文化与人类精神的铸造者和体现者。而且，基于他们对知识价值和人类福祉所具有的天才的判断力，他们必须具有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对整个地球生命存在的高尚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为此，科学家应拥有一种特殊的优秀品质和高贵的牺牲精神，一种“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超前意识和博大胸怀，一种横扫世界林林总总、洞穿未来千年岁月的犀利目光。而这种品质、精神、意识、胸怀和目光的形成，关涉到科学家所具有的道德修养和对探索这个世界的真谛而存于内心的永恒的焦虑以及真正的追求动机。于是我们说，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沉重的一个角色，科学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 目录

开 场 白摇文学与科学的生死情缘…… 1
第 一 段摇国，国家的国 …… 19
第 二 段摇想自杀，不敢 …… 30
第 三 段摇右派，什么是右派？ …… 39
第 四 段摇科学到底姓什么？ …… 48
第 五 段摇躲进猪圈，偷听国事 …… 55
第 六 段摇摘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 …… 61
第 七 段摇二十年鞍钢，二十年尴尬…… 69
第 八 段摇“ 共产党真有好官 !” …… 87
第 九 段摇活着，就得像个人样！ …… 97
第 十 段摇谁是中国机器人之父？…… 109
第十一段摇去日本，考察机器人…… 123

摇

# 摇目录


第十二段摇知识 垣权力 垣党票，等于什么？…… 135
第十三段摇超越平常，搞出水下机器人…… 152
第十四段摇哪个男人，离得开女人？…… 163
第十五段摇妻子、日子和“ 海人一号 ” …… 177
第十六段摇着眼未来，创建机器人示范工程…… 190
第十七段摇离经叛道，为了另一个梦想…… 206
第十八段摇进军海洋，开辟人类新福祉…… 223
第十九段摇追求功名，但不追逐功利…… 245
第二十段摇科学家，一个沉重的角色…… 264
参 考 段摇关于蒋新松的另一种阅读…… 285
附摇摇录摇答编者问…… 306


圆

# 开摇场摇白

## 文学与科学的生死情缘

都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缘分。我与蒋新松的相识，或许便是一种缘分，一种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说来惭愧，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过去对蒋新松一无所知，甚至，我连蒋新松三个字都从未听说过。蒋新松早在[illegible]年怨月便来到了这个世上，可我在[illegible]年之后的[illegible]年员月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唱歌的蒋大为和死后才出名的蒋筑英外，居然还有一个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战略科学家”——也被有的人称之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

当时，我正为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illegible]》做准备。有一天，我在采访中听人很随便地给我提起一个叫蒋新松的人。说实话，我听后并无什么反应，更不可能引起什么重视，只是出于礼节，很顺便地问了一句：

“蒋新松是干什么的？”

对方一边拨着电话，一边淡淡地回答说：

“搞机器人的。”

我愣了一下，又问了一句：

“有什么特点吗？”

答：“当过[illegible]年的右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不知什么原因，就这短短的两句话——尤其是后一句话，我对蒋新松便一下有了几分激动。其想法是：搞机器人的专家很有职业特点，且人数少，鲜为人知。此外，[illegible]年的右派经历，不可能没有文学魅力。于是，我当即做出判断：蒋新松是个人物！应该是我追踪的重点目标。然而，大忙人的蒋新松行踪不定，一时间谁也说不清他到底身在何处，人在哪方？

我很快想法找到了蒋新松的电话，而后北京 原沈阳，沈阳 原北京，广州 原成都，南京 原天津，满世界找他。但始终杳无音信，无缘相见，直到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上午 [illegible]点，我终于才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二楼会议室第一次目睹到了蒋新松的尊容。

那天，国家科委在皇苑大酒店召开关于“ [illegible]计划 ”的一个高层专家会议，事前我从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蒙建东女士那里获得信息：中国高科技领域中一批最权威的科学家将出席此次会议，像水稻专家袁隆平、自动化专家吴澄、通信专家邬江兴、计算机专家李国杰等均要亲临会场，而作为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自然也会登台亮相。于是我于 [illegible]日上午 [illegible]点 [illegible]分驱车赶到皇苑大酒店，并住了下来，打算在此与蒋新松首次“ 接头 ”。

[illegible]时正，会议开始了，生物、信息、航天、激光、自动化、材料、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数十名专家纷纷落座，济济一堂。我坐在人群中间，拿出我事先拟定好的采访“ 黑名单 ”，首先与蒋新松对号。然而，科技界不像政界，一眼就能看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他们开会时，不按职位高低分前后，不依名望大小排座次，除了会议主持者和发言人坐于台上外，其余专家全都很随意地坐在下面，既不显山露水，也不装模作样，更不摆什么臭架子，而个个平平常常，实实在在，完全是一副真正的人的模样。因此，我很难分辨出谁是大科学家，谁是小科学家，谁是有名的专家，谁是无名的

专家，更不可能从人群中把蒋新松一眼就挑出来。我只好悄悄向身旁的人打听：谁是蒋新松？旁人伸手一指，我抬眼看去，这才恍然记起，就在几分钟前，我在过道上其实已经和蒋新松见过一面了，只是由于他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以及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实在过于普通过于平常，致使尽管一向并不以貌取人的我还是一不小心便将他忽略掉了。

此时此刻，蒋新松就坐在我前三排的一个位置上，正认真听取着别的专家的发言。一看便知，他绝不是我们在电视上或者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混“ 官饭 ”吃的“ 会客 ”，而是一个真正的与会者。他虽然没用笔作什么记录，却很容易看出，他已经完全“ 入会 ”了，并始终用脑子在记、在问、在想。

会议休息时，专家们大都散聚在二楼的阳台上，或彼此轻松地寒暄几句，或相互随便探讨着什么问题。蒋新松也在其间，却不见有大声的发言，而始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经人引荐，我与蒋新松见面，他态度不冷不热，我也不卑不亢，只是在我们的手握住的一瞬间，彼此都用一双真正的男人的眼光，认真审视了对方一眼。

蒋新松大约 [illegible] 米的个子，头发稀疏，身体微胖，有点“ 将军肚 ”，还有点驼背（后来他对我说，这是他当了 [illegible] 年右派留下的纪念）。他尽管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但看上去还是不像那种做学问的大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很是平常——平常得让你很难把他与他所干的一系列国家大事联系到一起；他的衣着打扮，也很朴实——朴实得让你看不出与一般的工人师傅有什么两样。因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朴素，很实在，就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位工人老大哥。但他眼神中不经意间释放出来的那分清高与傲气，还是被我一眼就捕捉到了，让你不可能把他和一般的“ 工人老大哥 ”混同起来。

当天中午，我和数十名科学家共进午餐。进餐厅时，我暗中“ 跟踪 ”着蒋新松，见他落座后，便自然地坐在了他旁边

的位置上。多年来，我涉猎于官场、商场、文场（文艺界）、记场（新闻界）、电场（电视界），在这些场合相聚吃饭时，或相互敬酒，或彼此神侃，总是难免烟熏火燎，热热闹闹。但与科学家们一起吃饭，情景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来就不会大吃大喝，也没有钱大吃大喝，他们的伙食标准一般都很低，即使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餐桌上的内容也简单得如同自己家里一样（实话说，还不及我家的饭菜可口；我在宾馆吃“官饭”，还从来没有吃到过如此普通的饭菜），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把吃饭当回事情。而且，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更不大声喧哗，甚至在端碗举筷、吃饭夹菜等一系列微小的动作中，也表现出一种极为有序的温馨与宁静——如同一群老蚕，在默默吞吃着一树桑叶。仿佛吃饭，也是一道严谨的工作程序，一个随便不得的研究课题，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便可领略到科学家们生活中另一道饶有意味的风景。

在与蒋新松同桌吃饭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入桌就餐时，在有许多空座位的情况下，却偏偏挑选了一个紧靠右边的位置（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坐右边？他说，也许是当了[illegible]年的右派，习惯了吧）；二是他吃饭的速度很慢，脑子里好像总在想着什么事情，甚至在他每次伸出筷子去夹菜和夹上菜后慢慢往嘴里送的那一小段过程中，脑子里也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因此，吃饭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成了一种很不情愿又不得不对付的形式，甚至说是一种负担。望着他那副忧深思远、完全没有肠胃蠕动快感的样子，我隐隐替他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沉重。

“蒋老师，我准备写一部反映中国高科技知识分子的书，书名暂定为《中国[illegible]》，想和你谈谈。”我终于开了口。

他继续吃饭，继续想事，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片刻，他才抬起头来，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慢腾腾地吐出几个字来：“我有什么好谈的？”

这话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自己，还有点像是在问这个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世界，语气如同刚从窗外吹来的凉风，冷冷的，硬硬的，让人觉着有点看破红尘、不近人情的味道；但又让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话绝对没有一点虚假。

我凭直觉判断：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心独特世界的人物，而这个内心世界往往只属于他自己，外人是轻易进不去的。于是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急，并很快把刚刚提起的话题引向一边，对他故意采取了一种“冷淡”的态度。我知道，对付这样的科学家，不能操之过急；你越急，他越会觉得你有功利的东西，而科学家们是最讨厌功利这东西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急于对蒋新松进行采访，而只是暗中对他进行观察，尤其注意听他每次在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的确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念的新颖与思维的逆向运用上。比如，有人说某个项目准备如何如何做，他则会讲哪些哪些不能干……由于他的一些观点总是独树一帜，颇有新意，所以常常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久久受用的启发。

从皇苑大酒店回来后，我便开始与蒋新松进行实质性的联系。可我一连给他在清华大学的“家”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直到 5天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时，话筒那边才终于传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声音：“喂，我……我是蒋新松！”我说，我是李鸣生，还记得吗？他说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到外地几个工厂考察去了，刚进家门，手上的电脑还没放好呢！我说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很想和你聊聊——注意，我有意避开了“采访”这个字眼，目的是想尽量淡化我要采访他的意图。而他的态度也很科学：既不谢绝，也不应诺；既没多少热情，也不失去礼节，最后是有些犹豫不定地放下了话筒。

为了能尽快采访上蒋新松，我当机立断，第二天便专门住进了清华大学。蒋新松的家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由于他是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加之他是“ 愿景计划 ”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工作常在北京，所以在国家科委的协调下，清华大学出于对他的照顾，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给他住。我一住进清华大学便与他联系，但他的安排实在太满，让我一时很难进入他早已设定好的工作程序，直到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上午，他才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同意晚上 [illegible] 点 [illegible] 分在他“ 家 ”与我见面。

晚 [illegible] 点 [illegible] 分，我准时敲响了蒋新松的“ 家 ”门。他刚一开门，我便注意到，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我想，他大概是以时间来判断我是不是一个有信誉的人。他为我沏茶倒水间，我注意到，他的这个“ 家 ”完全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 家 ”里除了两张极其简陋的沙发、一部放在写字台上的便携式电脑、一个自做的书架（后来我听说，书架是他自己设计的）、以及一个早已过时的普通水壶外，剩下的便是清苦、孤寂和一片空空如也了。但在他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 家 ”里，却能让你嗅到一股纯正、清新的书卷气息，给你一种“ 宁静致远 ”的感觉；尤其是写字台上那部正在高速运行的便携式电脑，如同一座智慧的金山，让你一下便能感受到知识的富有和精神的张狂，使你很自然地便会对房间的主人肃然起敬。

我开诚布公，说出打算写写他的意图。他听后笑了笑，还是不冷不热，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有什么好写的？”

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上我猜测，他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发自内心不愿被外界宣传；二是他对我的写作动机和能力表示怀疑。于是我急忙说道：“ 我并不是想把你作为什么典型来宣传，而只想请你从一个普通人、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和我随便聊聊。如果可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份参考，或者说一点教训。再说，写你，也不单是为你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整个科技事业。”

他想了想，说：“那就聊聊吧！”

于是，我们从机器人的角度进入，开始聊了起来。他先向我介绍了国内外机器人的发展情况，然后谈了为什么他要坚持在中国搞机器人的想法。但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交谈，谈得并不随意，也不生动。为了缓解一下气氛，我有意引开话题，问他业余时间都喜欢读什么书？他说他在中学时代就很喜欢文学，文史哲三方面的书都喜欢读，比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尤其喜欢读英雄人物和一些大科学家的传记，像牛顿、哥白尼、爱因斯坦什么的。我发现，说到文学，他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整个身心一下变得轻松起来，近50岁的生命仿佛顺着时间的隧道一下回到了童年，一脸的清高和矜持也顿时一扫而光。

他说，我不光喜欢读文学作品，有时还喜欢写点小散文什么的。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篇看看，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说着便将一页传真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接过一看，是一篇小散文，题目叫《旱鸭子下水了》。但由于字太小，加之传真的效果极差，许多字我都看不清楚。我说我带回去看吧，他说不行不行，只有这一份清样，对方还等着我返传回去发表呢！我说你为什么不在电脑里多存上一份呢？他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自己；我喜欢不断否定自己，常常在今天就把自己昨天的东西否定掉了，我从来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中前进的，所以我从来不保存这些东西。再说，我从中学起就不喜欢记笔记，而喜欢用脑子记。这些东西脑子里有的是，什么时候想要，再写就是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来念，你来记。说着，他一边在屋里踱着步子，一边便很得意地念了起来：

小时候我家有个小院，有一年养了几只小鸭子，毛茸茸的小东西特别惹人喜爱。院子内没有水池，一天，我拿了个小盆，将一只鸭子放进盆内，喔！它们

一个个都惊恐万状，哗啦哗啦，把我衣服都弄湿了。妈妈一把拉起我，说：“你看，把一身都弄湿了，那旱鸭子哪能下水呢！”旱鸭子第一次下水的好玩景象，从此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脑海里。

70年代末，我赴日本考察机器人回来后，面临一个问题，发展我国机器人事业从哪里开始呢？当时正值“四人帮”倒台不久，城市就业问题还很大。中国人多，要不要自动化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机器人并不是人，只是一种新的、柔性的机器，但人们对它还是忧心忡忡。

……

我飞快地记着，生怕耽误了他的也是我的宝贵时间。记完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篇关于水下机器人的散文。我合上采访本，望着他那一副悠然自得、一脸真诚的样子，心想：这哪像一位年近古稀的科学家哟，分明就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小顽童嘛！

“没想到，你是搞科学的，还有这么好的文采。”我说。

“我电脑里还有一篇小散文呢！”他似乎意犹未尽，说，“那篇比这篇写得好。”

“打开看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说着，他按动电脑的鼠标，开始查找文件目录。可他一连查找了好几个子目录，也没找到那篇散文。我急忙俯过身去，帮他查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的电脑里存放的文件大约有上百个甚至上千个，什么《访苏报告》、《访美报告》，这个计划、那个设想，密密麻麻一长串，而且不少都是英文。我们一起又查看了好几十个文件，还是找不着那篇散文。我看时间已过 点，忙说算了算了，不能再找了，以后再说吧。可他嘴上说好吧好吧，手上却还在一

个劲地按动着鼠标。我怕影响他休息，只好起身告辞，并与他约好明晚再谈。

翌日晚 苑点 猿园分，我再次敲响了蒋新松的房门。他刚一开门，便连连叹息道：“ 哎，昨晚你走后，我又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找不着那篇散文；今天早上 源点起床后，我又找，还是没找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坐在了电脑面前，伸手握住了鼠标。

我急忙劝阻道：“ 千万别找了。你就是找出来，我也不看了。”

他说：“ 这不是看不看的问题，而是这篇东西肯定在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 ?”

他做事的执著与认真，实在令我感动，但我还是说：“ 你电脑里的文件太多了，所以找不着。不着急，以后有时间再找吧，我今天很想听你聊聊你的人生经历。”

“ 那好吧。” 他无可奈何地把茶几上一个装有几个橘子的碟子往我面前推了推，示意让我吃，然后非常友善地与我面对面坐了下来。我这才发现，今晚的他，对我少了几分矜持与戒备，而多了几分热情与信任。他凝视着桌上的电脑屏幕，一动不动，仿佛一下便沉入到了一种不堪回想、难以诉说的尴尬与苦涩之中。而此时此刻，清华园周末的夜晚一片安祥宁静，没有歌声，没有喧哗，只有淡淡的风从窗外柔柔地吹来，默默地传递着一种少有的清闲与难得的和谐。不知什么原因，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有了一种预感：今晚很可能要发生点什么？

果然，蒋新松敞开心扉，向我无所顾忌地谈起他苦难的童年、苦难的少年、苦难的青年以及被打成右派后苦难的 圆园年……他谈得很认真，很投入，很朴实，也很动情。直到他突然中止了话题，我才发现，这位当过流浪儿、童工、右派并差点自杀的科学家，实在是有太多的话需要向我们、向这个世界倾诉了。他那压抑、沉积、封闭了几十年的内心世界，仿佛就

像一条突然解冻的小河，今晚终于找到了尽情奔泻的出口……谈到后来，我们彼此似乎都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忘了都谈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谈；尤其谈到他 50年的右派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时，他声音发哽，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为了掩饰失控的情绪，他将一张 CD 插进电脑，片刻，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便在房间里悠悠回荡开来。他和我静静地听着“ 英雄 ”与“ 命运 ”的搏斗，彼此心照不宣，默不作声。大约过了几分钟，他才缓缓说道：“ 多年来我一直很喜欢听这首曲子，说不清什么原因，只要一听这曲子，便有一种解脱感和超脱感，便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仿佛这首曲子就是贝多芬为我而写的，它简直成了我的精神鸦片。”

接着，他在音乐声中向我谈到他的志向、追求、梦想以及一系列有关中国下个世纪的科技战略构想。谈完后，他又颇有感慨地说：“ 我时时都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因为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要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过去是想干不让我干，现在既然让干了，我没有理由不甩开膀子大干。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好了，太难得了！我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我注意到，在他所有的言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国家 ”这个字眼，如“ 国家大事 ”、“ 国家形象 ”、“ 国家利益 ”、“ 国家尊严 ”，等等。尤其是后来当我们谈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问题时，他更是满脸兴奋，激动难抑，几乎是对我宣布说：“ 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把解决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的钥匙！”

“ 是吗？” 我又一次激动起来。

“ 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年了。给你看一份我刚刚写好的研究报告吧。” 说着，他当即动手，用他的便携式电脑专门为我打印了一份。打印完后，他很激动，一边在屋里踱着步子，一边不停地摇晃着手中的研究报告，像摇晃着一面小小的

国旗。

我接过这份还散发着油墨气息的、长达 猿万字的研究报告，急忙翻看起来（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他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大中型企业问题作了客观而独特的分析，并指出了“突围”的路径和发展的方向，大胆提出了大中型企业必须重组的理论。其思想之深刻，观点之新颖，材料之厚重，论证之严谨，笔锋之锐利，令人拍案叫绝，怦然心动。

“这份研究报告我准备尽快将它送到国家领导人的手上。”他说。

我为能成为他这篇研究报告的第一个读者，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从内心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我还是不无担忧地说：“大中型企业问题，恐怕是目前中国最难的一个难题了！”

“正因为难，我们就更应该去探索它！这是当代科学家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我相信，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解开这道难题！”他在屋里走了几步，显得很是兴奋。然后，他顺手加大了悄阅的音量，充满强烈悲壮感的《英雄交响曲》顿时像空气般充满了整个房间。也许是受到了音乐的感染，他的情绪变得激昂起来，面对我一个听众，却如同在清华礼堂作即兴讲演：

“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但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科学本身的魅力所在。我的欢乐，就是无穷的苦恼；我的幸福，就是永远的探索。这是我的座右铭。

“我从员缘岁打成右派后到今天，一直忙忙碌碌，没有什么大悲，也没什么大喜，唯有祖国和科学，是我心中最大的依恋。我最欣赏的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那句话，‘不要问国家给予了你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都做了些什么。’只要能为我的国家做事情，即使有一天倒下，我也死而无憾。搞科学，

就得有探索精神，就得有不怕下地狱的精神。至于个人的名誉地位，生死荣辱，我早已置之度外。”

……

蒋新松越讲越激动，越讲越兴奋，有些话猛一出口，竟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没有一句不是真的，没有一句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一直谈到午夜，才不得不暂时道别。

回到清华大学招待所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想起了已故著名作家徐迟老人，想起了 [illegible]年前被徐迟发现的数学家陈景润……作家与科学家，文学与科学，似乎从来就有着渊源的联系，不了的情缘；而这次，我与蒋新松的相识，莫非又是一次奇遇？又是一种情缘？……我越想越睡不着，无奈之中我只好起身踱出门外，沿着清华园的小径独自散起步来。

此时，深夜的清华园显得格外的空旷与宁静，除了几对还顽强地依偎在树丛的恋人和几颗高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外，整个校园仿佛都沉入了一种熟睡的状态。我很想让劳累了一天的脑子松弛下来，却怎么也摆脱不掉蒋新松刚才与我谈话的情景……清华大学，历来是一个出大师的地方，而被清华聘请的蒋新松，无疑是中国科技界一位难得的人才和帅才。中国能有这样一个科学家，实乃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老百姓之大幸！然而，如此一个难得的人才，一生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艰难呢？

在此后的两天时间里，我与蒋新松又进行了几次交谈：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中国，关于世界；关于今天，关于未来；关于他的追求与梦想，关于他的志向与抱负；关于他的家庭与爱情，关于他的幸福与痛苦。总之，蒋新松对我几乎无所不谈，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临别那天，我特意签名送了他一本我写的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他接过书，随手翻了翻，连连说道：“好，我们人类应该有走出地球的雄心和气魄！”

从清华大学归来，我的心情好几天也平静不下来，总觉得蒋新松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首先在家里的饭桌上向我妻子和儿子谈起蒋新松，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总忍不住要说上几句，可每当我提到“蒋新松”三个字时，得到的第一反应总是：“蒋新松是谁？”“唱歌的，还是踢球的？”“是蒋大为的哥哥，还是蒋筑英的弟弟？”甚至还有人反问：“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与蒋介石有关吗？”

就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是科学家——哪怕是一次错误的猜测！但固执的我并不就此甘心，一有机会，便随便搞点“民意小测验”：

——北京皇城根小学，是全国最好的小学，就在我家的门口。一日，我路过该校门口，问几位小学生：知道蒋新松吗？

回答不知道。

——北京四中，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也在我家的门口。一日，我来到该校的门前，问几位中学生：知道蒋新松吗？

回答也不知道。

北京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名牌大学。一日，我到该校采访，路过未名湖畔，我与几位大学生闲聊，顺便也问了一句：知道蒋新松吗？

几个大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还是不知道。只有一个学生问了一句：哪个系的？

……

这看来有些荒唐，其实也属正常。因为在我们这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度里，仅仅知道蒋新松是个科学家的——还姑且不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除了他单位的同事和相关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